

重新发现“自然”：抗战前燕京学派 社区研究传统的三重转换

社会
2025 · 1
CJS
第 45 卷

刘圆圆

摘要：作为学科史研究对象的燕京学派，对其的讨论还远没有结束。本文沿着燕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轨迹，呈现抗战前社区研究传统的三重转换。早期燕大的社会学研究笼罩于“宗教与社会合一”的视角下，致力于社会再造。自许仕廉开始，衡量社会学学科发达的标准在于与自然科学的切近程度。作为社会试验所的清河市镇，是燕京学派“区域”研究传统的开端，将控制“自然”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在吴文藻以功能分析涵化人文区位学的理论转向促成了社区研究的学术转向后，“文化”这一无法被控制的社会恒常，成为社区研究的重心。当“功能”取代了“因果”，“比较法”取代了“实验法”，“社会的自然史”取代了以往简单机械的“社会的历史重造”，也标志着社会学真正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在此过程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从来都不是彼此的对手，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传统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从未脱离自然，而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逐渐转向关于“人”本身的文化分析。

关键词：自然 燕京学派 教会大学 社区研究 清河试验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25.01.009

**Rediscovering “Nature”: The Threefold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nching School’s Sociological Tradition of Community Studies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LIU Yuanyuan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the Yenching school, as an object of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is far from over. In the mids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Yenching sociologists went deep into the countryside

* 作者：刘圆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Author: LIU Yuanyu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soc_liuyuanyuan@pku.edu.cn

本文初稿曾在上海大学第十三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云南大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研讨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第十一届博士生论坛上宣读。感谢渠敬东、田耕、卢晖临老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对我的悉心指导和鼓励，张巍卓、侯俊丹、王欧、颜燕华等多位师友也为本文提出建设性意见，也衷心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宝贵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and suburbs, market towns and border regions, and produced a number of classic community studies that had become everlasting traditions.

This paper follows the trajectory of the discipline of sociology at Yenching University to present the threefold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nching sociological community studies prior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early sociological studies at Yenching were shrouded in the God's perspective of "one unity of religion and society" and were devoted to social reconstruction. Then from the time of Xu Shilian, the view became that the closer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ology were to natural science, the more developed sociology would become. The town of Ching Ho, as a social laboratory, initiated the original tradition of "regional" studies, in which the control of "nature" was seen as a measure of social progress. The third academic shift came when Wu Wenzao incorporated the theoretical shift towards human ecology with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thereby "culture", a social constancy that cannot be controlled, became the focus of community studies. When "function" replaced "causality", "comparative method" replaced "experimental metho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ociety" replaced the previous simple and mechanical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it mark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ology as a discipline truly different from natural science.

In this process,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were never rivals to each other, and the community studies tradition of the Yenching school was never detached from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it, but rather they wer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o approach step by step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Keywords: nature, Yenching school, christian college, community studies, social experiment in Ching Ho

一、引言:返回学术史的前半段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底正处在向人文性转换的阶段,这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构造的把握和对学问总体形态的省思正迈向一个新阶段(渠敬东,2021)。中国社会学研究文明转向的基因,孕发于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民国时期。在蜕变中的中国社会,借由西方传教士主导的一系列“科学”的社会调查,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史和学术史开始呈现更为丰富的样态。宗教成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开拓者研究和理解社会的

起点。

早在 18 世纪,西方的传道团如北美长老会、美国公理会就陆续抵达北平,向平民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开展社会救济(杨景循,1928:5-6)。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基督教的势力向学生界、思想界与政界渐次伸张(甘博,2010:423)。以美国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学者参与到对我国近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并引导了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调查取向。¹借由基督教教堂和成熟的教会组织,西方的传教士经常进行社会调查。在动荡中的北平,活跃在街头巷尾的人力车夫、埋身于工厂苦干的地毯工人、幽禁在北平监狱的落魄囚犯、居住于西郊的民众的生活情状都经由社会调查进入大众视野,跃然于各式各样的问题表之上(陶孟和,1925;包立德、朱积权,1924;Dittmer,1919)。与此同时,以基督教教堂作为社会试验的场所,西方的传教士通过组建地方服务团、开办工厂、兴办女子学校,有针对性地对平民教育、公共卫生及政府力所不能及的市政管理工作进行补救(韩玉珊,1924:24-25;杨景循,1928:30-31),深入参与到地方的政治事务中,极大程度地形塑了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形态。

这一时期,由热衷于“社会再造”的一批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成为宣扬宗教教义、搜集中国材料、实施社会改良服务的主要阵地(李景汉,1927:80-82;曲士培,2006:359-361)。在这批西方的传教士中,由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和步济时(John Burgess)主持的对东方城市的首次社会调查——“北京的社会调查”,被约翰·杜威(John Dewey)称为“是任何外国传教界中以基督教观点而做的最好的社会调查”。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位——甘博,负责主持组建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而另一位——步济时,则成为燕大社会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在中国各大高校中,燕大社会学系是最早成立的几个社会学系之一。后来在吴文藻提倡的“社区研究”思路下发展出的燕京学派,更是成为中国社会

1. 1914 年至 1915 年,北京社会实进会曾用简单的问题表调查 302 个洋车夫的生活情形。1917 年,清华大学教授狄特莫指导该校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 195 户家庭的生活费。1918 年至 1919 年,在中国北方有甘博先生和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等仿照美国春田调查在北京开展调查,调查的结果在 1921 年用英文发表;同时,在中国的南方有沪江大学教授葛学溥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调查共 650 人的凤凰村,调查结果在 1925 年用英文出版(李景汉,1927:80)。

学本土化讨论的前提(周飞舟,2022)。在社区研究思路的指导下,燕大社会学系的学子深入内地和边疆、乡镇与城郊,涌现出一批社区研究的典范,被系统性地编入各种社会学学科史的导引性著作中,成为当下仍然活着的传统。

然而,仔细检视当下对燕京学派的学术研究,我们的目光被牵引着聚焦在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上。通过阅读社区研究的经典作品,在较短时间内熟悉“社区”等概念,不失为一种“捷径”。但因在纷繁复杂的文本轨迹中,对社区研究的理论源流和方法论的讨论多呈现碎片化、片面化、去情境化的特点,模糊了“学科”与“时代”间的有机联系,也难以厘清其与具体田野实践的关系(王铭铭,1997;刘雪婷,2007;杨清媚,2015)。将早期的燕京社会学与吴文藻之后的燕京学派,以布思(Booth)式的社会调查同后期的“社区研究”相对立(李章鹏,2021:276),只是一种简化的理解,对社区研究方法和早期社会学研究品质的理解仍是断裂的(田耕,2017;侯俊丹,2021)。因此,早期燕京学派社区研究中没有被廓清的传统提醒着当下的社会学研究要重返学术史的前半段,对跨越时空交错承继的学术传统进行再反思。费孝通先生晚年为跟上时代变迁的步伐,决心重温派克的社会学,进行“补课”(费孝通,2021a:453-455)。费老尚且如此,何况是当下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我们。

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在学术脉络中的缺席与断裂,试图通过重返相对不那么典型的社会学民族志作品,对今天学界习以为常的从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的简单思路进行反思。从“外部状况”和“内在状况”两条线索出发,将学术的人生史与研究的谱系学进一步结合,对于我们理解早期的社会研究大有裨益(田耕,2017,2019,2023)。为衔接不同时代情状下的社区研究脉络,有学者对燕大社会学系以“试验区”为基础的社区研究进行再考察。以清河试验为例,有学者发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早期的社区研究与吴文藻之后的社区研究是既延续又超越的关系(侯俊丹,2021)。有研究进一步将社区研究的讨论范围推展至赵承信主导下的平郊村试验,并对比吴氏和赵氏社区研究方法之异同(齐钊,2013,2023)。燕大学子写作的学位论文被视为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朱浒、赵丽,2006;赵晓阳,

2016),可以帮助我们推演出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历程(岳永逸、熊诗维,2023)。

在研究的层积累进中,早期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知识谱系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但社区研究的脉络依旧相对分散,对20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初留存的学生论文的使用依然停留在简单的分类描述层次。如果说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做的社会学研究至今仍被视作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那在其指导下“非典型”的学生习作,文本轨迹之间则酝酿了师承之间的温情,并间接促发了老师们的学术生命。

本文旨在接续研究者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社区研究传统的努力,聚焦于抗战前燕大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一个学系在变动的时代境况下如何不断地重新组织“教与学”。将作为“学科的学术”与作为“问题的学术”相结合,沿着燕大社会学在时代中的发展轨迹,探讨不同时期的社区研究是如何顺应时势之变,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改造,并用于指导燕大学子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实践。

二、对神学的驱逐:迈向“自然的社会学”

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竞争与相互作用使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的地位,西方的传教士站在了中西文化竞争的前沿。在西方传教士看来,“教育”在竞争中远比军事力量、商业刺激或其他手段联合起来在特定时间里所产生的效果大得多,也最能够对道德、社会和国民性的转变进行全面的征服。在科学被选中成为传播福音的手段后,传教士就必须面对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先天紧张,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将科学与上帝联系起来(Bridgman,1836:378-379;费正清,1998:7;罗志田,1996)。因此,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大学的建立,在宣扬用基督教拯救中国、传播福音的同时,重点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专门的社会调查人才,注重提升学生社会服务的能力。在中国社会之变局中开展实际的社会工作,谋求社会再造。

1919年建立的燕京大学,创立之初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美国人司徒雷登任校长后,努力使燕京大学世俗化、中国化,在学术关怀上推崇中西文化融合。“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在学生的课程设置上体现为很早便对学生开展职业教育(王学珍等,2010:431-433;曲士培,

2006:235-236)。1922年秋,甘博负责组建燕大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是由普林斯顿-北京基金会选派和资助的步济时。早在建系之前,为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构造,在步济时的协助下,甘博调集一批资深的传教士参与北平的社会调查,他称之为“未曾尝试的社会实验”(甘博,2010:4)。这一成果发表后,被很多燕大学子如严景耀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证据加以使用。

早期的燕大社会学,无论是从教学人员、科门设置、课程安排抑或是学生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来看,都具有浓厚的宗教服务色彩,因此也被称为是“服务于西方基督教的社会学”(杨燕、孙邦华,2015)。建系伊始,专任教师1人、义务讲师5人,均是美国人(傅懋冬,1982)。在1928年的科门设置中,“宗教社会服务研究科”修业时期最长,并开设“原始宗教”“基督教社会思想”“宗教社会学”等课程。

表 1: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28 年科门设置²

科门	修业时间	毕业所得学位
社会学本科	至少四年	学士学位
社会学研究科	至少一年	硕士学位
社会服务学本科	至少五年	学士学位及社会服务证书
社会服务学研究科	至少二年	硕士学位及社会服务证书
社会服务专修科	二年	社会服务证书
宗教社会服务研究科	至少六年	神学士及社会服务证书 (与本校宗教学院合作)
宗教社会服务速成科	至少一年	速成科证书(与本校女校合作)
社会服务函授科	不定,大约一年	函授科证书(与本校女校合作)
暑假学校	办法临时酌定	详章询燕京大学暑假学校主任

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燕大社会学系的30篇学位论文,研究主题聚焦在宗教慈善和都市问题上。从研究材料看,大部分论文都是图书馆研究(library research)的产物,而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成果,也大多基于二手观察、文件证据和轶事材料进行演绎和推测(Fosdick, 1952:194)。其中,研究基督教相关的学位论文占五分之一。社会学系的学生将教堂、学校和监狱的报告书以及与教会牧师的通信信件作为研究材料,并亲自到礼拜堂实地调查,采访宗教和教会领袖。

2. 《社会学界消息》,1928年,《社会学界》第2期。

结合在北平的实地调查,社会学系的学生韩玉珊与姚菁英指出,在动荡中的北平,人们渴望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愿望寄托于追求更真实的宗教生活。耶稣思想具有天然的“社会性”,“宗教”与“社会”是合一的。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必须与大自然即所谓的“上帝”合一,才能对社会有整个且透彻的意见(韩玉珊,1924:3-4;姚菁英,1930:22)。而组织结构臻于成熟的教会组织,则是先进的社会变革得以萌芽,启发民智的社会服务得以开展的试验所(杨景循,1928:2)。

表 2: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位论文中以宗教神学
为研究主题的学位论文(1920s—1930s)

学生	答辩日期	论文题目	研究法与具体的 资料收集方法
韩玉珊	1924年	A Study of the Place and Func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Social Progress, in Peking, since 1900	文献研究
杨景循	1928年	调查十七间北京基督教礼拜堂报告书	文献研究 实地研究 统计调查
陈文仙	1930年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osition of Women in Peiping Christian Churches	文献研究 实地研究 参与观察 访谈法
梁传琴	1930年	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八年中国基督教机关之社会政策及其事业	文献研究
林悦明	1930年	Charity Institutions in Peiping	实地研究 统计调查 访谈法
姚菁英	1930年	耶稣思想的社会价值	文献研究

基督教会传道的同时,在抵制鸦片、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妇女地位、提供医疗救助、进行慈善救济等社会服务方面促进了社会进步(梁传琴,1930:4-9)。教会在北平开设的慈善机构,对穷人、孤儿、残障、老人、乞丐进行救济(林悦明,1930:32)。由教会建立的女子医学院,开创了女性参与现代科学医疗事业的先河。基督教女子高中如华北卫理公会女子高中的兴办,为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提供教育,从而为女性开辟了教学、医疗和社会工作等新职业,并带来了更好的家庭生活(陈文仙,1930:6-12)。在乡村中,农民赌博、酗酒、抽烟等违背天父律令的恶习,需要教会应用耶稣的原则,通过社交聚会、集体讲道和个人谈话的方式向农民解释《圣经》,在精神上帮助农民,让农民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

(梁上鳌,1923:16-17)。

不难看出,对早期采用社会调查方法重建社会事实的学生们来说,宗教成为理解和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起点。而实际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界和学术界就对扎根于西方历史习惯的宗教旧说借由传教士之言被部分国人视为新知、将中国的社会进化皆归功于宗教的教育思想进行反思,认为这其实脱嵌于中国实际的社会民情。陈独秀进而提出中国教育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放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蔡元培,[1917]2002:21-22;陈独秀,[1917]2002:29-30)。1923年,张君勱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引起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也将究竟何为“科学”的讨论推向了高潮。尽管这次讨论并未得出也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中国式“科学主义”的流行、对科学方法万能的崇拜以及认为主观与客观全然不可逾越与沟通的观念,也对后一阶段中国的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雷颐,1989;林毓生,1989:300-302)。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燕大社会学系建系初期极具基督教传教色彩的社会调查风气并未持续很久。自1924年开始,系里开始陆续聘任中国社会学家执教,如许仕廉、朱友渔、陶孟和、李景汉等。³1926年,系主任步济时返美求学,主任一职由许仕廉代理。⁴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师加入到教学队伍中,如王文豹、陈翰笙、吴文藻等。建系初期旧式社会学家讲社会问题离不开神学、玄学、哲学的口气,离不开种界、国界的观念,离不开习惯风俗的势力;当时的调查也大半是外人的成绩,又是英文著作(许仕廉,1928:17;李景汉,1927:99),实际从事社会调查的研究者都难掩对资料匮乏、数据不实的失望(陈焕锦,1927:3;严景耀,1928:34)。面对这些问题,燕大社会学系的中国教师开始对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建设和作为一个“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进行反思。

在课本使用和学术自主性上,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教学时使用外国人的教科书,虽然可以作为过渡时代的办法,但如果不研究中国自己的社会问题,仍是外国社会科学的附庸(吴景超,1929:1)。社会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现代民族问题,对问题的主张和态度要重新评估,

3. 《附录二: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1933年,《社会学界》第7期。

4. 《燕大社会学及其工作》,1927年,《社会学界》第1期。

不能以他国作为标准(梁启超,1927:5)。在调查方法上,针对这一时期大多数坐在安乐椅上所作的社会学研究,李景汉根据自己在定县从事社会调查的经验,提出要“到民间去”细密地调查事实,研究方法,然后再下手工作,并指导燕大学子在成府、海甸一带挨门挨户实地调查农民的家庭情况(李景汉,1930:14;梁启超,1927:2)。此外,燕大社会学系还创办了《社会学界》等刊物,使中国的社会学者能整理中国的社会学材料,有自己的社会学田地可以耕耘。

表 3: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资⁵(节选)

教师姓名	聘任时间	职务	授课情况
王文豹	1927年	前司法部次长,时任监狱司司长	犯罪学讲师
李景汉	1927年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调查主任	社会调查班义务讲师
华义侠	1927年	社会服务函授科、社会服务速成科主任	主持社会服务函授科、社会服务速成科
陈翰笙	1927年	讲师	农民运动
牛卫华 ⁶	1928年	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应用社会学
杨开道	1928年	前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	乡村社会学
吴文藻	1929年	教授	家庭问题及社会学原理
张鸿钧 ⁷	1930年	专任讲师	应用社会学、社会行政各科、社会服务指导
严景耀	1928年	助教	刑罚学及监狱行政科目助教

时任系主任的许仕廉更是进一步主张“自然的社会学”,主张社会是自然的产物,社会现象是有自然基础的(许仕廉,1928:4-18),并在《社会学界》上刊文具体阐述其主张。⁸许仕廉受俄国社会学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学说的影响,布哈林主张社会学其实是自然科

5. 根据《社会学界》1927年第1期《燕大社会学及其工作》,1928年第2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界消息》,1929年第3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九二八秋季消息》,1930年第4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概况》、附录一、附录二整理。

6. 牛卫华(J. I. Newell)系美国韦尔斯利大学(Wellesley College)社会学系主任。

7. 张鸿钧是燕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1926至1927年协助甘博调查北京社会情形,1927年到芝加哥大学留学,1928年获得社会行政院文学士;毕业后,获得罗氏基金会津贴继续研究,由社会学系电召回国。参见《附录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行政学系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工作略述》,1930年,《社会学界》第4期。

8. 许仕廉于1928至1930年连续3年在《社会学界》上相继发表《社会生活的理化基础》《社会生活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心理基础》,具体阐释其“自然的社会学”主张。

学,社会生活有固定的自然法则,社会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正如自然界的昼夜交替一样规律(Bukharin, 1925: 19-20)。受中国文明有机式的宇宙观影响,许仕廉认为社会学就是自然科学的主张不免稍涉偏宕,并从社会科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出发,将其与自然科学作出界分,进而构建起对整个宇宙世界的想象。“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自然现象去而复来,“演”而不“进”,故是“四方上下”。人文现象往而不返,进而无极,故是“古往今来”。人文科学研究的是各种文化的事物状态。而研究文化现象的社会科学,自脱胎时便天然具有人文性质。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在文化,而文化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终点(许仕廉, 1929a: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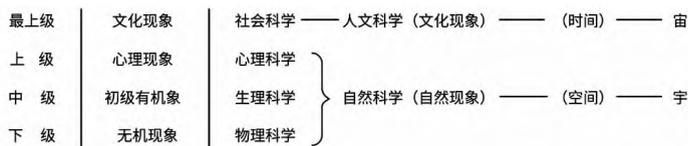


图 1: 现象四界与科学四级 (许仕廉, 1929a: 13)

虽然许仕廉认为社会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但社会现象却有其自然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有机体与环境发生关系而生发出的种种“势力”。一切文化不过是后起的枝节,以满足人类的自然兴趣。社会文化的分布受制于自然法则。地球上的各项事实都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都不过是自然史之一部分。此外,受美国行为心理学的影响,许仕廉认为,一切社会行动是受环境刺激而起反应的自然现象,而社会学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分析社会现象界的事实,搜寻自然法则,以求运用(许仕廉, 1928: 15-18, 1929b: 84)。

此时燕大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于教会神学主导时期的社会调查(认为神主宰一切社会现象,并天然具有社会救济的合法性)。当自然取代了神,成为一切存在之根源,社会便只是自然构造的一部分。严景耀先生对中国犯罪现象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研究转向。在王文豹先生的指导下,学生严景耀为了摆脱西方研究犯罪现象之定式,开出中国人自己预防犯罪的药方,亲自“下狱”去。虽然同样是借助问题表的方式开展社会调查,但对社会现象成因的解释却脱离了神学的怀抱,转而向孕育社会现象的自然寻求解释。严景耀认为,社会变迁是靠社会力(social forces)推动的,犯罪是一种阻碍社会变迁的社会力。在分析犯罪

成因时，严景耀首先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考察气候变更与犯罪的密切关系(严景耀,1928:33-34、63)。此后,伴随其他中国教师的陆续加入,燕大社会学系创系之初的社会学研究逐渐由宗教色彩浓厚的社会服务取向转向“自然的社会学”,试图搜寻支配社会运作的自然法则,神学逐渐被驱逐出社会学的领地。

三、控制“自然”: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清河试验区

我们从社会学的观点上,觉得对于一个地方,用相当的时间,作数量分析的研究,较比普通用概略的方法叙述社会生活为有价值。因此我们想找一个适当地方,作这种研究之用;并且决定这个地方必须是5000人口以内的一个乡村或市镇。

(许仕廉,1931a: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起。在认同社会调查是科学认识社会的方法的前提下,在高度关注农村危机的社会氛围中,燕大社会学系将社会调查的重点逐渐从都市转向了农村(赵晓阳,2016)。1930年2月,社会学系设立清河试验所,希望清河能够成为华北一个模范自治市镇。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许仕廉牵头,杨开道主要负责,张鸿钧兼任试验区主任的清河试验区,集中了当时整个燕大的农村工作,在邹平、定县土洋两派之间,起到了一定的沟通作用。在工作阵线上,许仕廉负责对外对内联络,张鸿钧负责实地试验工作,杨开道负责实地研究工作(杨开道,1935:12)。

清河试验所正式成立之前,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1928年秋季由余协中负责、杨开道指导,燕大社会学系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河人口调查和乡村组织调查。⁹调查的理论基础是杨开道引入的吉勒特(John Gillette)的农村社会进化论和社区分类学,以及高尔宾(Charles Galpin)的乡镇社区调查方法,被视作开创了早期燕大社会学关于“区域”的研究传统(侯俊丹,2021;傅春晖,2021)。根据调查结果,许仕廉认为清河市镇是一个理想的区域社会,也是极佳的工作单位和试验范围,可以作为中国村镇生活的一个代表。¹⁰而清河试验所设立的主要目的

9.《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九二八秋季消息》,1929年,《社会学界》第3期。

10.《附录二: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1933年,《社会学界》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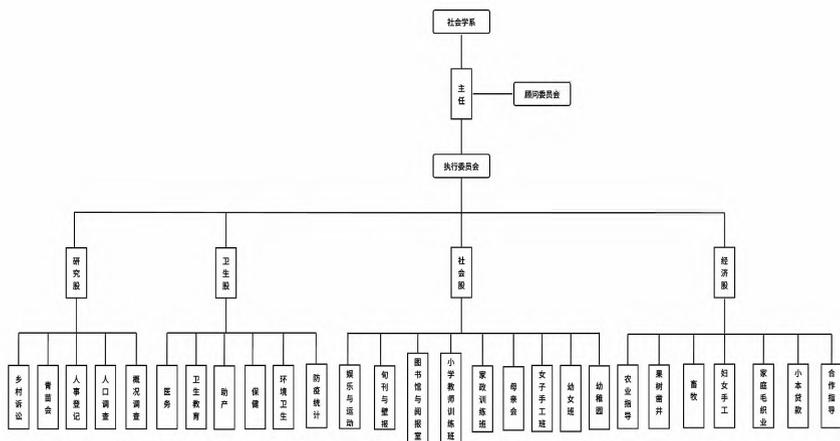


图 2：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试验区组织及工作表

是为社会学系的同学们提供实习机会，从人群生活中求“真知识”。清河作为采用实验法研究社会学的“试验场”，终极目的是要发展一种合宜的社会控制技术，以控制从自然史中衍生出来的人口和社会组织，进而统治人类社会环境。只有提供给清河人民最适宜的环境，才能让清河人民做出最适宜的反应，以发挥最大限度的自存能力（张鸿钧，1934：63-65；Barnes and Davis，1931：410-419）。

试验区划定清河镇及其附近四十村作为工作范围。清河镇位于四十村之中心，全区之中央，为四十村之商业交通中心点。试验区隶属于燕大社会学系，工作人员由系里委派。试验期限定为七年，七年期满，由已受训练的当地人进行自治（张鸿钧，1934：65-70）。继试验区建立前的人口和组织调查，社会学系又开展了更加深入的实地调查，系里的师生“到民间去”，到清河试验区埋头苦干（梁树祥，1935：10）。

表 4：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30 年实地调查种类（节选）¹¹

甲	调查清河农村大小及环境适应关系
乙	清河农村领袖研究
丙	清河集市之研究
丁	乡村农民态度之研究

具体而言，试验区的工作分经济、社会、卫生、研究四股，以经济建

11. 参见《燕大社会学系近况调查》，1931年，《社会学界》第5期。

设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其他工作也以间接或直接改进农民经济状况为目的(邓淑贤,1934:12)。来此实习的学生的学位论文主题也围绕各股的实际工作,如经济股的小本贷款工作(李鸿钧,1934)。在燕京大学研究股人员的帮助下,燕大经济系的学生郑宝沪研究清河的市集经济(郑宝沪,1937)。社会股则主要聚焦于妇女及儿童的教育工作:邓淑贤关注清河妇女工作的组织和推广(邓淑贤,1934);梁树祥则以清河小学为切入点,研究乡村教育问题(梁树祥,1935);邱雪峩利用在清河镇进行妇女工作实习的机会,对清河镇的产育礼俗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地调查(邱雪峩,1935)。

据统计,燕大师生围绕清河试验区开展的研究一直持续到1938年。学生们多利用在清河实习的机会进行调查。在此阶段,燕大社会学研究顺应时势之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舒服的安乐椅上写文章,倡导要“到民间去”开展社会调查(梁树祥,1935:11)。经过整理,这一时期以清河镇及其所属村落为基础的社区研究如表5所示。

表5:燕京大学以清河镇及其所属村落为基础的社区研究

作品	作者	出处	导师信息
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调查委员会	1930年燕大社会学系单行本;中译节选以《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为题发表于《社会学界》1931年第5期,第1-10页	
中国乡村改进运动的几个试验	朱宣慈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31年6月	受杨开道先生的影响更大
中国北部人口的结构研究举例(附表)	许仕廉	《社会学界》1931年第5期,第55-71页	
黄土北店村的研究	万树庸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1932年5月	杨开道指导,许仕廉主任及张鸿钧教授指正
清河镇试验区的合作事业(附表、图)	许仕廉	《合作讯》1933年百期特刊,第37-39页	
清河农村社会中心区(附图)	许仕廉	《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2期,第1-8页	
清河镇社会实验工作	许仕廉	《村治》1933年第3卷,第2/3期,第1-4页	
中国乡村建设之最低工作单位讨论	许仕廉	《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12期,第59-64页	
河北昌平县概况	燕大清河试验区研究股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第5、6、7期,1933年10月4日、11日、18日	

(接表5)

作品	作者	出处	导师信息
清河镇人口调查初稿	张折桂	1933年(未刊稿)	
宛平县五区十村人口调查初稿	张折桂	1933年(未刊稿)	
中国乡建之事功与进行方法讨论(附图)	许仕廉	《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第81-86页	
礼俗调查的尝试:北平清河镇附近四十村	张折桂	《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第40、41、43、46、47、48、49、50期,1934年6月27日,7月4日、11日,8月1日、8日、15日、22日,9月5日	
卢家村	蒋旨昂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1934年5月《社会学界》1934年第8期,第36-105页	评阅者杨开道、吴文藻
社会计划与乡村建设	许仕廉	《社会学界》1934年第8期,第263-269页	
清河小本贷款研究	李鸿钧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1934年5月	评阅者杨开道、吴文藻
北平印子钱之研究	刘志博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1934年5月	评阅者杨开道、吴文藻
清河试验区妇女工作	邓淑贤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1934年5月	评阅者杨开道、吴文藻
清河小学	梁树祥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1935年5月	评阅者吴文藻、法学院院长陈其田
清河合作	杨骏昌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1935年5月	评阅者吴文藻、法学院院长陈其田
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	邱雪峯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1935年5月	评阅者吴文藻、法学院院长陈其田,吴文藻指导材料整理
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	王贺宸	《社会学界》1936年第9期,第343-363页	
清河市集的经济研究	郑宝沪	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学士学位论文,1937年5月	评阅者郑林庄
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	黄迪	《社会学界》1938年第10期,第359-424页	

注:1.此表是截至本文发表前作者搜集到的燕京大学师生有关清河市镇及其所属村落的研究成果;2.张折桂为燕京大学清河试验区研究股股长。

清河镇的一切社会生活制度都以经济为基础。然而长期以来,清河镇的农民深受高利贷盘剥,其中利率最高、流行最广的印子钱为害甚深。因此,刘志博对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印子钱进行结构分析,考察其在贫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功用,为的是移去社会演变途中的礁石(刘志博,1934:14-16)。为祛除高利贷带来的社会病态,发展生产事业,经济股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行小本贷款。通过扩大小本贷款作为四十个村落的金融周转机关,在借款人身上“施行”各种工作,根本目的是为“训练”借款人的合作常识(李鸿钧,1934:11-16)。同样,妇女和儿童也是需要接受“训练”的重点对象。妇女思想守旧、受教育程度低、工作技能缺乏,因此要联合经济与其他各股对妇女开展教育和卫生工作。鼓励妇女与地方领袖、本地男子合作,接受公民训练(邓淑贤,1934:34-36)。为帮助乡间妇女减轻最为繁重的育儿工作,要从调查试验区妇女的产育礼俗开始,为的是改除农村女子养育儿童的陋习。此外,还要开设幼稚园和托儿所,针对儿童开展工作,清河小学就可以成为乡村小学的一个榜样(邱雪峩,1935:15;梁树祥,1935:137)。

尽管清河试验区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调查过程中学生们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农村风俗相对保守顽固,民众泥守传统习俗,社会调查的国民普及度较低,出现农民不愿甚至拒访的现象(李鸿钧,1934:4-5;邱雪峩,1935:12;梁树祥,1935:1-2)。相比乡村建设运动中开设在其他各地的试验区如定县、晓庄、徐公桥等,学生们认为与其他试验区一样,清河试验也没有抓住乡村改进的途径。改进乡村还要反思工作路径,注重训练乡村的领袖(杨骏昌,1935:150-155;朱宣慈,1931:3)。此外,燕大师生还对清河镇所属村落进行调查,如万树庸在杨开道的指导下调查黄土北店村,蒋旨昂则以昌平县卢家村为研究对象,分十个章节详尽地描述了村庄的社会生活(万树庸,1932;蒋旨昂,1934)。¹²

这一时期,学生们开展社会调查前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统计研究、局内观察、个案研究是较为常用的方法。¹³在研究材料上,由研究股

12. 万树庸对黄土北店村的村落区域、村史、村民、家庭、铺户、学校、庙宇、社会组织青苗会和村中的四季生活进行了详实描述;蒋旨昂分十个章节,从地理、发展、人口、家庭、经济、教育、宗教、休闲、政治、对外关系来描述村庄的社会生活。

13. 基于学生们在论文中对自己所用研究方法的介绍。

积累的各试验区的研究报告及参观试验区者的记录及感想也是分析的材料(邱雪峩,1935:3-5;杨骏昌,1935:2)。在开展调查时,对统计方法的推崇是一大特色。统计表格几乎是每篇论文附录的组成部分,少则十几个表格,多则近五十个表格(邓淑贤,1934:10-11;刘志博,1934:5-9)。学生写论文时以数量表显示社会情况,将事实情形用具体的数字表现出来,既明了又准确(邓淑贤,1934:191-192;梁树祥,1935:12;李鸿钧,1934:17),并对同一研究对象采用多个不同的调查统计表进行考证,以确保资料的可靠性(朱宣慈,1931:11-12)。个案调查和统计研究经常搭配使用,互为补充(万树庸,1932:17),但部分学生认为个案调查所获材料因不用一定格式之调查表,所获得的经验和印象只能作为研究的参考,而不能作为研究的证据。此外,个案的代表性也为学生所关注(刘志博,1934:3;邱雪峩,1935:12)。虽然“追求客观,避免主观”是学生们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共同的研究取向,但对于何为“主观”何为“客观”的理解却不甚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基于清河试验区及其所属村落的社会调查,学位论文中两种殊殊的方法论取向逐渐显现。其一,强调要采取科学和客观的研究方法调查乡村社会,注重数据和表格资料的绝对客观性,将个案研究收集的材料视作主观因子掺杂其间,应尽可能略述。其二,批评大量使用表格进行统计和用数字呈现事实的社会调查方法。如负责主持清河人口和社会组织调查的杨开道就认为数目统计的调查方式并没有触及中国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得不到农民的真正同情,也无法抓住农民的内心生活。社会现象“活”在人们彼此相互的关系中,需要从心态和行动层面入手研究,在横向上做静态的社会结构研究,在纵向上做动态的社会程序研究。而清河试验中的社会调查既未能从横向上分析群体结构,如基于夫妻关系组建的农民家庭,也未能从纵向上进入农民的心态,展现农民的共同生活与其所居住的社区内其他各环节的连串关系(杨开道,1930a:2-7)。

试问一个表格、十个表格甚至百个表格能把农村社会、农村生活的一切询问出来么?什么现状都用数字表现,试问领袖的性质、夫妻的爱情,以及种种抽象的、神秘的现状也可以用数字表现出来吗?(杨开道,1935:12-13)

实际上,杨开道并非反对通过社会调查对社会现象做数量方面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调查研究的单位太大或太多,无法做出精深的研究;而个案研究的长恰好能够补社会调查的短,两者可以实现社会研究方法的最好配合(杨开道,1930a:20-21)。在杨开道和吴文藻的指导下,刘志博研究北平印子钱时,尤其注意被调查者之“自然史”的发展,采用个案调查来做“动”的研究,并结合印子账作为客观的研究材料(刘志博,1934:17-18)。在吴文藻先生的指导下,邱雪菡在调查清河镇妇女的孕育礼俗时就认为“有调查礼俗的表式,发给人们按式填寄,其结果不还在白纸黑字上得了些千篇一律的报告,和不尽不实的批评。这样搜集的材料,无异于闭着眼睛去喊改良。而最好的方式是调查者身入民间,与民众同生活,作直接的自然的观察”(邱雪菡,1935:1、8、15-16)。不难看出,此时燕大学子的社区研究已经开始出现方法论取向上的明显分殊,但分殊并不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对立或非此即彼,而在于“礼俗”等文化现象,并不能完全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得的数字表征加以解释。因此,学生们才转向个案调查,将其与统计研究搭配使用。实际上,采用具体精微的个案研究方法,去研究社会生活中相对稳定的“恒常”及其衍生机制,至今也是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追求科学性的表现(渠敬东,2019a)。而在清河试验时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就已经在实地研究中明白了这一道理。

此时的燕大社会学人并未否认社会现象的自然基础,如邱雪菡将礼俗视作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生命,是一种在长时间的习惯连续刺激下,通过减少人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抵抗,逐渐使人的某种行为趋近于自然,并最终固定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礼制(邱雪菡,1935:7-9)。作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组成部分的礼俗,有其发展的自然史,因此,在清河试验中才无法通过施加强力控制而即刻获得改良。换言之,清河试验采取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研究社会现象,从一开始就已经预示着控制社会环境的失败。

总体而言,在清河试验时期,社会科学这一原本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不能应用的领域,也逐渐被自然科学的方法侵入,造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接近,不同处与其说是在方法,不如说是在对象。社会科学界逐渐采取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现象当作

自然现象加以研究,将人的行为当作对环境刺激的自然反应加以控制;放弃了心理、伦理、哲学等方法,应用了以数量为对象的统计研究,以行为为对象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以及以地域组织为对象的境地研究(ecology study),而境地研究又被称为人文境地学。在清河试验区及其附属村落的社区研究中,尤以吴文藻指导下的邱雪菡对清河镇的产育礼俗研究为代表,反映了社区研究和人类学功能学派重视文化研究的特点。¹⁴

四、改造“自然”:人文区位学和功能派人类学的引入

(我们)认为甘布尔、伯吉斯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在摸索中却找到了人类学这个冷门,提出了所谓“社区研究”的新路子。

(费孝通,2021b:150)

实际上,对清河调查的反思,在试验区工作开展时便在燕大社会学内部展开。早在1930年,社会学系就曾邀请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公开讲演。¹⁵1932年,许仕廉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介绍派克教授》一文,为后期社区研究的转折埋下伏笔。受燕大社会学系的邀请,1932年秋和1935年秋,派克和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布朗教授先后来到燕大讲学。派克设“集合行为”及“社会学研究班”两个短期课程,指导研究班学生的论文,深刻影响了彼时在燕大就读的学子如周叔昭和严景珊。¹⁶功能派人类学家布朗在燕大也开设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比较社会学”¹⁷课程,即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人类学。派克教授在燕大讲学时,吴文藻就曾旁听他的“集合行为”课程,并参与“社会学研究班”的讨论。深受布朗影响,吴文藻对功能派人类学的吸收,也改变了清河试验早期社

14. 《附录二: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1933年,《社会学界》第7期。

15. 《附录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行政学系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工作略述》,1930年,《社会学界》第4期。

16. 周叔昭和严景珊曾带领派克参观北平某监狱,而那个监狱正是周叔昭和严景珊所作毕业论文的田野点,二人于1933年分别写出毕业论文《北平诱拐的研究》和《一个北平惯窃自传的研究》。

17. 布朗将采取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旧派社会人类学称为民族学,而新派社会人类学则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称之为比较社会学(即功能派社会人类学)(吴文藻,[1935a]1990:123)。

区研究的走向(吴文藻,[1934]2002:7;侯俊丹,2021)。

表 6:燕京大学 1935—1936 年度课程¹⁸(节选)

课程	授课教师	学分	授课情况
比较社会学	拉德克利夫·布朗		一个半月短期课程,每星期四小时
社会学研究班	拉德克利夫·布朗		短期课程,每星期两次,每次二小时
社会运动自然史	严景耀	0-3	第三(须经特别允许)、四、五年级选修
社区调查	赵承信	3-3	第三、四年级选修
社会人类学	吴文藻	3-0	第二年级社会学主修生必修
家族制度	吴文藻	0-3	预修课程:社会学原理、社会人类学

(一) 反思清河试验:无法“控制”的社会“恒常”

清河试验中的社会调查用数量表显社会状况,试图发展出一套合宜的社会控制技术。而派克则反对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过热及救世主义,不赞成社会科学家投身社会改革。他认为统计无法呈现出事实的所以然,研究的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的过程或社会本身,因此是死板的“社会古董学”。而派克提倡的人文区位学,被认为是将社会统计学与地理社会学相结合,使两者变成运用不息的关系(Rice, 1931;许仕廉,1933:3-4)。取材于生物学中的植物区位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史学等思想资源的人文区位学,发展出了根本区别于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如“位置”“流动”和“自然区域”。人文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位置”发生变化进而产生“流动”,社区才有了脉息。在流动中,不同能力的个人或团体发生社会作用,常生类别,并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最适合的区域居留,从而形成“自然区域”。而“自然区域”就是人文区位学研究的基本单位——社区(赵承信,[1933]2002:73-78)。在吴文藻看来,人文区位学并不是一种新学问,只是一种最新颖的环境论。区位学的中心思想,在地理一方面,是“空间区域”,是“地理位置”;在社会一方面,是“人口流动”,是“经济分工”。换言之,是以围绕文物制度的环境——地理的或社会的环境——为着眼点(吴文藻,[1934]2002:15)。

18. 《附录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度概况》,1936年,《社会学界》第9期。

主张“功能派人类学”的布朗同样深知社会科学家在人类社会中,犹如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中那样,想要得到严格的人为控制,事实上是绝对不可能的。至多可以将被调查的社区,加以相当的控制后,由受过充分训练的研究员来作精密的实地观察。布朗将中国视为由许多较小社区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集体,期望应用比较方法,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作“不同形式社会”的精密研究。社会人类学可被视作一种自然科学,人类间的精神现象和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一样,都受科学法则的支配。其不同之处在于,在人类社会中,不能应用真正的实验法,只可应用间接的实验法即是比较法,以求那支配人事界的一切法则,故称之为社会人类学,也就是比较社会学。在吴文藻看来,布朗比较实地研究的经验最为丰富,是在社会科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最为彻底亦最有成绩的一人。他所提倡的功能法,也包括了实地试验的比较法,在社会科学中是一种间接的实验法(吴文藻,1936:21-23)。换言之,就是本着自然科学的方法,以考察社会现象。

这种人类社会的自然科学观,意思是说,一切现象都受科学法则的支配,不但物理化学的无机现象,或生物心理的有机现象,要受法则的支配,便是社会文化的超机现象,也一样要受法则的支配。所谓法则,意极简明,即是说,凡可以观察的现象,常呈现恒久不变整齐划一的性格,在过去既是如此,在未来亦是如此。因此,布朗相信功能法的运用,即在于寻求社会文化领域内的一般法则。(吴文藻,1936:21)

相较于清河试验中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上的因果概念直接研究社会现象,将社会行为视为受环境刺激而产生的自然反应加以控制,此时的燕大社会学人已经认识到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无法直接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现象间互相依赖的“功能关系”(吴文藻,[1935a]1990:122-127)。社区研究的主旨不在于控制社会,而在于了解社会。因此,必须对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改造,对社会现象中无法加以控制,也无法用因果关系加以解释,而又常呈现出的某种“恒久不变整齐划一的性格”进行研究。用“功能”观点取代“因果”关系,用间接的“比较法”取代直接的“实验法”,而研究的入手点就是“文化”。

(二) “动”起来的社区研究:由“社会的历史”到“社会的自然史”

作为人类学家中的自然科学爱好者,布朗认为社会人类学可以被视作一门自然科学。与布朗不同,派克认为“实际研究社会,由着历史的纪述走到自然史的类别,便是真正社会学的出现,便是与旁的自然科学站在同等正确地位的社会学的出现”(许仕廉,1933:5)。

实际上,派克和布朗都批评以往的实地研究只单纯观察和记载事实,而叙述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只是一种对于“社会的历史”的记载,拼凑出来的死板事实呈现的也只是一种社会静止状态(许仕廉,1933:5;吴文藻,[1935a]1990:134)。如在进行关于清河市集和市镇形成的研究时,通过时间和过程中的组织描述社会演进来把握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变迁是远远不够的,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应力图对社会变迁机制也就是文化的作用加以揭示(许仕廉,1933:1-6;郑宝沪,1937:5-22)。“历史”只能给社会学提供要研究的对象,但无法洞察某物的用处、功效和它在每个人心目中的不同意义。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力创造的种种仪式、风俗、礼节和文字,对这些事物意义的洞察,一定要先明了文化中的一个元素与其他元素的密切连锁关系,以及这一文化元素在该民族生活中的位置。而考察的方式,不仅要外表上的活动入手,还要从与其连带的人的思想和感情入手。派克进一步承用了托马斯(I. E. 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 Znaniecki)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使用的生命史研究法,由私人生活史进入个人除非加以注意才能自觉的对自身与他人、自身与社会之间的态度和认识(派克,[1929]2002:44-49)。

此外,派克尤其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的自然史”,而不是“社会的历史”,它们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自然史”乃是说明某种现象、某类现象变动的程序,是应用范畴的制定。派克借助一份报纸的自然史,说明自然史是幸存物种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结果。现在市场上能够被我们看到的每一份报纸,都经历过生存的斗争才在现代社会中幸存下来。社会也具有它发展的自然历史,以及组成该社会的分子,即社会中有身份的个人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所决定的特色(Park, 1923, 1929;许仕廉,1933:4)。

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吴文藻赞同“功能派人类学的目的,乃在了解文化的本质,而不在进化的臆测,或以往历史事件的重造”。所谓进化的臆测,指的是进化学派追求事物的“太初起源”及营造其“发展阶段”;“以往历史事件的重造”,则是针对那自命为反进化论的一切历史学派而言(吴文藻,[1935a]1990:130;Malinowski,1932)。文化是社区研究的中心,明白文化便了解了社会,功能派人类学即是对文化的比较研究。为帮助从事实地比较研究的调查者,吴文藻先生将马氏的文化表格引介,作《论文化表格》一文(吴文藻,[1938]1990:190-253),并在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理解。“社区”有时间、历史和地域范围的限制,社区的研究一定要是现代的。从事社区研究要有计划地分区调查国内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同的社会实况,从而认识我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变迁(吴文藻,[1935b]1990:145-150)。派克的人文区位学和布朗的功能派人类学被引介后,对彼时燕大学子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极大程度上形塑了后期燕大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学科品质。

不同于清河试验采用实验法研究社会现象,将社会作为“实验室”。这一时期直接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不被视作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进行任何创造性的工作之前,必须认识到实验室工作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比实地研究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化,是对社区研究的功能分析(李安宅,1932:12;Li,1938:126-127)。

受人文区位学影响,杨庆堃用“自然史”的方式理解邹平农村市集,尤其关注因“流动”带来的系统和功能差异。市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构造物”,而是像自然界的生物那样,有兴起、成长、衰落和死亡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必须放置在“区位的境界”(ecological order)上才能理解。市集的基本结构是由“自然的形势”和“社会力”两种力量共同形塑的,其兴衰除受到自然力如地势高低、交通改善、河道变迁等影响外,也极大地受到“社会制裁力”或“社会政治力”的操纵。市集的兴起、发展、衰落和死亡,是“社团选择”的结果。杨庆堃还将邹平地区的工业化历程与世界上其他各部的工业化历程的变迁轨迹进行比较,进而把握中国的社会变迁(杨庆堃,1934:144-151、305)。1934年获得芝加哥

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严景耀,在写作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也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的“生命史”研究法。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借助个案调查,梳理罪犯们的生活史,从而反映罪犯所处的社会环境。同样是研究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不同于1928年写作的《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此时的严景耀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已经认识到之前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统计材料,无法展现犯罪的过程以及罪犯个人对社会的态度,也不足以从时间上说明犯罪现象可能的发展趋势,因此无法呈现犯罪现象动态的“自然历史”(严景耀,1934:211-214)。

受功能学派调查方法的影响,曾选修过派克“集合行为”短期课程的林耀华在其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中将义序的“宗族乡村”界定为“社区”,并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生命史的研究方法,通过族人的精神及心理状态研究其态度、意见、见解与思想。在分析的入手点上,林耀华纵横追踪考察祠堂的功能结构和整个宗族社会各部分的连带关系,并使用生命传记法研究个人生命。林先生将个人传记中的关键时间节点放置于个人与家族团体、个人与宗族团体的关系脉络中,从中透视整个宗族社会各个部分与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宗族社会的“文化重心”,呈现了一种动态的社会历史趋势(林耀华,1935:1-10)。

在吴文藻以功能分析涵化人文区位学的理论转向促成了社区研究的学术转向后,这一时期燕大社会学涌现出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杨庆堃的《邹平市集研究》、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花篮瑶》等经典的社区研究作品。直至抗战后,作为吴文藻的学生,深受社会人类学影响的李安宅,将社区研究的方法用以研究自身所处的社会。1938年,李安宅开始在甘肃开展以拉卜楞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被视为第二代燕京大学社会学人在抗战期间完成的最出色的民族志之一(田耕,2023)。费孝通在家乡进行田野调查写成的民族志《江村经济》,以及林耀华使用生命传记法和内省式的民族志手法写成的《金翼》,也是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实际上,《义序的宗族研究》关心的古今之变的文明问题,也为林耀华先生后来写作《金翼》埋下了理论思考的种子。《金翼》采用的编年史写作法,是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追踪全面的社会关联,将“社会”的自然展开作

为其构造的环节和脉络(渠敬东,2019b,2021),这与吴文藻倡导的现代社区实地研究中对“社区”精神的理解相一致。这些经典的社会学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其问题化或发问的源起处,开始进入到对中国社会自身文明的研究脉络中,焕发出比清河试验时期的社会学研究更为强劲的生命律动。

五、“区域社会”“自然社会区域”“社区”

实际上,无论是控制“自然”,还是改造“自然”,都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因此,本文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区域社会”“自然社会区域”和“社区”,在不同世代的燕京社会学人如许仕廉、杨开道、吴文藻那里的不同意涵。

在乡村建设运动思潮中设立的清河试验所,旨在用系统的方法,将科学的技术运用到一定的社会计划单位里,这个单位就是“区域社会”。所谓区域社会(community),就是一个区域内的人口团体,含有空间或地理意义(许仕廉,1931b:55-56)。在区域社会中,有三个要素是至关重要的:人口、资源和技术。其中,人口是社会的生物基础,也是区域社会的立足点。资源是社会的物质基础,包括矿产、土地及水力。技术是社会的文化基础,“文化”是在技术发明创造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是“技术”发明的衍生品和附属品,包括从各种发明、习俗及传统的运用中分别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在这个区域中,一定人口的道德、风俗与地理分布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且区域、人口和社会组织之间必须形成恰切的匹配关系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许仕廉,1930,1934:263-269)。

在许仕廉“区域社会”的基础上,杨开道进一步明确了以“自然社会区域”作为培育农村地方社会公民精神的基本单位(侯俊丹,2017)。杨开道认为,基于行政区划对清河市镇进行分割,人为地阻断了农村的经济交换系统,将其与商业中心的“乡镇”分割开来,本身就违背了农村社会自成一体的社会分工,也违背了农村社会作为一个自然社会的性质。他特别强调农村社会不单有心的交感,还有共同生活。农村社会也有人民、土地、主权三要素,是一种地方共同社会(杨开道,1929:8-9,1930b:46-48)。杨开道还特意区分了“community”和“society”的异同。

其实 society 所代表的,是一切普通的社会,凡两个以上个体的集合,而有心感作用的,都可以叫作社会。所以普通社会的要点,只在心的交感。假使集合的个体,有共同生活——共同目的和共同事业——便成了一种共同社会。这种共同社会,可以用 community 这个名词去代表。(杨开道,1929:8)

在吴文藻引入派克和布朗的学说时,“社会”与“社区”同样需要加以辨析。吴文藻延续了派克的观点,将有形可见的“社区”视为“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现,有实质的基础,自然容易加以观察和叙述”。而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是实体。社区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人民、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以及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吴文藻,[1935b]1990:144-145)。值得注意的是,派克在人文区位学中实际上也借鉴了高尔宾的研究,作为讨论“自然区域”的根据(赵承信,[1933]2002:73),而高尔宾同样也是杨开道思想形成的理论源流之一。正是在对派克和布朗的观点加以综合后,吴文藻提倡对现代社区进行实地研究。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社区”是去历史维度的。从时间上来看,“社区”前有现代二字,社会学应该研究的是现代文明,至于过去的社会可以让历史学家去研究。“社区”是文化在时间和地域上的一个历史和地理范围,对社区时间性的认识,较之地域性的认识尤为重要(吴文藻,[1935b]1990:144-147)。

综上所述,同样是“community”,许仕廉的“区域社会”和杨开道的“自然社会区域”与乡村建设思潮下如何开展农村自治运动这一实践取向紧密相关。许仕廉的“区域社会”,是一种社会计划单位。人口、资源和技术是区域社会的主要组成要素,“文化”是在技术发明创造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是技术的衍生品和附属品。杨开道虽然也认为农村社会是一个理想的自治单位,但他批评行政区划违背了农村作为一个“自然社会区域”的性质。更重要的是,人民互相发展出心的交感,在共同目的和共同事业中过共同生活。而在吴文藻看来,“社区”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是可以直接被观察到的,至少包括人民、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以及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而“文化”正是社区研究的核心。社区是文化在时间和地域上的一个历史和地理范围,有特定的史地经纬限制。

六、余论：拓宽学术史的视野

燕京学派的学术遗产并未随着 1952 年燕大的撤并而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至今仍是没有成为过去的“经典”，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学学科史、思想史需要“补课”的重要内容。在学科史的视域范围下，将课程体系、教学师资和学位论文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从中看出一条相对完整的学术史脉络。本文从不同世代燕大社会学人复杂的文本轨迹中提炼出“自然”这一核心概念，旨在勾勒和串联起抗战前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脉络。以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为切口，本文总结出抗战前燕京学派社区研究传统的三重转换。每一重转换中不同世代的燕大社会学人对社会学研究进路的理解分殊，背后体现的是在蜕变中的中国社会，一般知识阶层对于中国整个社会构造的想象和把握。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发现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传统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来都不是彼此的对手，就如同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类文明，本质上都是世界的“恒常”，社会本身就是自然构造的一部分。

早期燕大社会学研究的第一重转换，是将笼罩在宗教神学“上帝视角”下的社会学解放出来，使“社会”回到“自然”的怀抱。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本就是自然史的一部分（许仕廉，1928：15-18），将败退到社会现象领土上的神学家驱逐出社会学的领地。在第二重转换中，燕大社会学人面临着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学科化”，同时也要“科学化”的处境。作为中国晚近发展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研究方法的进步。因此，社会学就向最为发达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取经。清河试验区的成立即是“按中国社会情形，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五千人的地区可成为一自然社会单位，故全中国可按一万五千个单位来分别处理”（许仕廉，1934：264）。此时的“社会”就如同自然科学实验室中显微镜下的“细胞”一般，被解剖为一个一个带有自然特征的社会计划单位。在研究方法上，也大量借用自然科学的统计方法，用数量表显社会情状，对从自然界形成的历史即“自然史”中衍生出的人口和社会组织进行控制，并以此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此时，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与其说是在方法，不如说是在对象。

第三重转换则酝酿于清河试验区工作开展过程中。如杨开道就认为,数目统计的调查方式没有触及农村社会的本质。清河试验中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上的因果概念来研究社会现象,将社会行为视作只要施加环境刺激就会产生的自然反应加以控制,实际上无法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关联性,难以呈现动态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必须对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改造”,对社会现象中无法加以控制,也无法用因果关系加以解释,而又常呈现出的某种“恒久不变整齐划一的性格”进行研究。因此,吴文藻在吸收了人文区位学和功能派人类学的思想后,用“功能”观点取代“因果”关系,用间接的“比较法”取代直接的“实验法”,用动态的“社会的自然史”取代以往简单机械的“社会的历史重造”,而此处的“自然史”指的是“社会的自然历史”,必须放在“区位的境界”上才能够理解,研究的入手点正是“文化”。此时的文化已经不再是技术发展的衍生品和附属品,而成为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生成的自然历史的入手点,社区研究的重心已经转为对“文化”内容的实质分析和对动态文化变迁的比较研究。自吴文藻先生开始,到后来的燕京大学社会学人如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他们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化或者说发问的源起处,开始进入到中国社会自身文明的脉络中,作为文明研究的社会学视野正在缓缓打开。

当下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越来越丰富,多学科交汇也带来了调查技术的多元化。我们的研究所得到的数据越来越精确,其精确程度与20世纪20年代燕大学子在写作论文之前手绘的社会基本地图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研究的内容却并没有更加深刻。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只见社会不见人”(费孝通,2003),又时而陷入“方法主义”的迷障中,基于此,有学者呼吁社会学研究要返回自身的文明视野中从“人”出发。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安宅就提醒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要小心脱离社会历史背景的各种“方法主义”(Li,1938:127)。对于个案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也同样是一百年前就读于燕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们进行社会学研究时的关怀,这本身就是一种交错承继的学术传统。

站在历史的后点,一百多年前燕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们追随自己的

老师,深入乡村与城郊、市镇与边疆从事社会学研究。在当下看来不那么成熟的学生习作,是彼时最前沿的社会研究方法和理论思潮最先接触田野时展露出的原初、稚嫩的学科品性。这些“非典型”的文本在接受老师指导的过程中,再与老师们的思想交织碰撞,层积地促发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燕京学派代表人物的学术生命。如今,对燕京学派社区研究脉络的挖掘还在不断涌现出新的意象,但旧的知识谱系中仍存在相当一部分被遮蔽的风景。如抗战后期的燕京学派在西南边陲的边疆研究以及在成都崇义桥镇开展的农村社会服务。社区研究的脉络至今仍未有被完整地呈现,这也是笔者将另文予以考察的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包立德、朱积权.1924.北京地毯业调查记[M].北京:京华印书局.
- 蔡元培.[1917]2022.以美育代宗教说[G]//新文化运动.复兴文库第一编第七卷.欧阳哲生,编.北京:中华书局.
- 陈独秀.[1917]2022.近代西洋教育[G]//新文化运动.复兴文库第一编第七卷.欧阳哲生,编.北京:中华书局.
- 陈焕锦.1927.进让村调查[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陈文仙.1930.A Preliminary Study of Position of Women in Peiping Christian Churches[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邓淑贤.1934.清河试验区妇女工作[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费孝通.2003.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5-16.
- 费孝通.2021a.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费孝通.2021b.留英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费正清.1998.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傅春晖.2021.早期燕京社会学的人文区位学研究——以杨庆堃的《邹平市集之研究》为例[J].社会学评论 9(5): 193-213.
- 傅懋冬.1982.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J].社会(4): 44-49.
- 甘博,西德尼·D.2010.北京的社会调查[M].北京:中国书店.
- 韩玉珊.1924.A Study of the Place and Func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Social Progress, in Peking, since 1900[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侯俊丹.2017.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J].学海(5): 95-102.
- 侯俊丹.2021.从清河到禄村:燕京社会学社区研究传统再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8(3): 119-127.

- 蒋旨昂.1934.卢家村[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雷颐.1989.从“科玄之争”看五四后科学思潮与人本思潮的冲突[J].近代史研究(3):131-149.
- 李安宅.1932.什么是社会学?[J].平民学院十年纪念特刊(1):18-22.
- 李鸿钧.1934.清河小本贷款研究[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李景汉.1927.中国社会调查运动[J].社会学界(1):79-100.
- 李景汉.1930.住在农村从事社会调查所得的印象[J].社会学界(4):1-14.
- 李章鹏.2021.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M].北京:西苑出版社.
- 梁传琴.1930.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八年中国基督教机关之社会政策及其事业[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梁启超.1927.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J].社会学界(1):1-20.
- 梁上鳌.1923.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Life[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梁树祥.1935.清河小学[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林耀华.1935.义序之宗族研究[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林毓生.1989.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林悦明.1930.Charity Institutions in Peiping[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刘雪婷.2007.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1935-1936[J].社会学研究(1):161-174.
- 刘志博.1934.北平印子钱之研究[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罗志田.1996.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J].历史研究(6):77-94.
- 派克.[1929]2002.社会学[G]//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齐钊.2013.社区·区域·历史:理解中国的三种进路——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的再分析[J].开放时代(6):107-120.
- 齐钊.2023.科学的中国社会学:赵承信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贡献与启示[J].河北学刊(5):150-159.
- 邱雪裘.1935.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曲士培.2006.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渠敬东.2019a.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J].社会39(1):1-36.
- 渠敬东.2019b.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4):98-122.
- 渠敬东.2021.中国社会科学的人文性[J].开放时代(1):80-84.
- 陶孟和.1925.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G]//孟和文存.亚东图书馆,编.上海:亚东图书馆.
- 田耕.2017.“社会调查”的内与外:思考早期社会研究的两种思路[J].学海(5):87-94.
- 田耕.2019.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28-1947[J].学海(2):21-33.
- 田耕.2023.交错继承的学术传统:以抗战期间的一些边疆研究为例[J].学海(2):

103-115.

- 万树庸.1932.黄土北店村的研究[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王铭铭.1997.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J].社会学研究(1):88-98.
- 王学珍、于洸、张万仓.2010.北京高等教育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吴景超.1929.几个社会学者所用的方法.社会学界[J].社会学界(3):17-23.
- 吴文藻.[1934]2002.导言[G]//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文藻.[1935a]1990.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G]//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吴文藻.[1935b]1990.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G]//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吴文藻.1936.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J].社会学界(9):1-42.
- 吴文藻.[1938]1990.论文化表格[G]//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许仕廉.1928.社会生活的理化基础[J].社会学界(2):1-18.
- 许仕廉.1929a.文化与政治[M].北平:横社.
- 许仕廉.1929b.社会生活的生物基础[J].社会学界(3):83-98.
- 许仕廉.1930.中国人口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
- 许仕廉.1931a.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J].社会学界(5):1-10.
- 许仕廉.1931b.中国北部人口的结构研究举例[J].社会学界(5):55-71.
- 许仕廉.1933.介绍派克教授[J].社会学刊(4):1-6.
- 许仕廉.1934.社会计划与乡村建设[J].社会学界(8):263-269.
- 严景耀.1928.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J].社会学界(2):33-77.
- 严景耀.1934.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景循.1928.调查十七间北京基督教礼拜堂报告书[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杨骏昌.1935.清河合作[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杨开道.1929.农村社会学[M].上海:世界书局.
- 杨开道.1930a.社会研究法[M].上海:世界书局.
- 杨开道.1930b.农村组织[M].上海:世界书局.
- 杨开道.1935.我为什么参加农村工作[N].民间(北平)(1):10-14.
- 杨清媚.2015.“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J].社会35(4):103-133.
- 杨庆堃.1934.邹平市集之研究[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杨燕、孙邦华.2015.许仕廉对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国化的推进[J].北京社会科学(10):68-75.
- 姚菁英.1930.耶稣思想的社会价值[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岳永逸、熊诗维.2023.社会学实验: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J].社会学研究(6):131-152.
- 张鸿钧.1934.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工作报告[G]//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乡村工作讨论会,编.北京:中华书局.
- 赵承信.[1933]2002.派克与人文区位学[G]//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晓阳.2016.寻找中国社会生活史之途:以燕大社会调查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 141-147.
- 郑宝沪.1937.清河市集的经济研究[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周飞舟.2022.社会学本土化的演进与本体[J].中国研究(1):3-20.
- 朱浒、赵丽.2006.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J].北京社会科学(4): 45-53.
- 朱宣慈.1931.中国乡村改进运动的几个试验[D].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
- Barnes, Harry Elmer and Jerome Davis. 1931.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Boston: D. C. Heath & Company.
- Bridgman, Elijah C. 1836. "Address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Chinese Repository* V: 8: 378-379.
- Bukharin, Nikolai. 1925.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Dittmer, Clarence Gus. 1919. "An Estimate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III: 107-1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osdick, Ramond. 1952.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Li, An-Che. 1938. "Notes on the Necessity of Field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938-1950) I(1): June.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32. *Sex and Repress on in Savage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Park, Robert Ezra. 1923.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9(3): 273-289.
- Park, Robert Ezra. 1929.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ts Fundamental Methods and Objectives*. London: Macmillan.
- Rice, Stuart Arthur. 1931.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A Case Boo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责任编辑:冯莹莹